

众所周知，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，是分为几个不同阶段的。英敛之、王郅隆年代(1902-1925)为创始时期；吴鼎昌、胡政之、张季鸾年代(1926-1949)为新记时期，其中，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到国共内战结束，更为大公报的鼎盛及转折时期；1949年迄今，大公报的变迁虽然十分曲折也比较复杂，但都是在新中国年代。

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吴鼎昌、胡政之、张季鸾，人称大公报“三巨头”，又称“三驾马车”。“吴鼎昌的钱，胡政之的人，张季鸾的笔”，形象描述了“三巨头”在大公报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和所做的贡献。

1931年5月22日，新记公司接手第五年，大公报发行满一万号，蒋介石派人送来亲笔题写的贺词“耕耘与收获”，称其“改组以来，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，声光蔚起，大改昔观，曾不五年，一跃而为全国第一流之新闻纸。”胡适也发来题为《后生可畏》的贺词说，大公报从一家地方性报纸晋升为全国的舆论重镇，当得起“中国最好的报纸”的荣誉。大公报之所以赢得这样的荣誉，“是因为他们在最低限度上做到了两条，第一登载确实的消息，第二发表负责的评论，这两条原本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到的责任，只是因为国内的报馆都不敢做、不肯做、不能做，而张季鸾们居然肯努力去做，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。”胡适的这个评价，也是对吴、胡、张合作的肯定。

但是，如果深入考察，从大公报的发展脉络看，吴、胡、张的合作大可研究。具体而言，在办报的目的与追求上，“三巨头”可谓志同道合不合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大公报后来的发展。

接手大公报，创办新记公司，吴、胡、张三人为什么一拍即合？——都想办一张中国最好的报纸，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；三人都是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，是“知日派”，并且对日本的报业都有过考

【书中风云】

大公报的『三驾马车』

察，(大公报的组织机构、分配形式等大都取法于日本报馆的模式)这是他们合作的基础。但办好报纸为什么？三人的想法却不尽相同。

吴鼎昌作为当时华北财阀领袖，极欲进入官场，因此需要政治资本。他曾说：“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：一是银行，二是报纸，三是学校，缺一不可。”由此可见他的办报初衷。后来他果然去国民党政府做了高官，验证了他的“预见”。不过，他也因此成为1948年中共点名的重要战犯之一。

胡政之做过王记大公报总编辑，失败了并不甘心，希望收拾旧河山，做一番大事业。他对办好报纸比吴、张看得更全面，更深远，付出也更多。胡政之一手栽培、曾为新记大公报骨干的著名报人徐铸成先生说：“胡政之艰苦创业，知人善任，全部精力扑在报上，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，但为人苛察精明，不时暴露出资本家的面目……”这应

是徐的切身感受，也是中肯的看法。正是在胡政之手上，大公报的事业发展达到鼎盛时期，他个人的愿望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，但同时，他也因此成为大公报各种“罪名”的重要承担者。

张季鸾是职业报人，以“文章报国”为己任，因“文人论政”而得名，他专注于写文章，热衷于交朋友，在报馆里很少过问编报以外的事务。1938年，大公报创办汉口版，周恩来曾对人说：“做总编辑，要像张季鸾那样，有优哉游哉的气概，如游龙飞虎，游刃有余。”1958年，新记大公报虽然已经“声名狼藉”，毛泽东还对主管新闻出版的吴冷西说：“张季鸾摇着鹅毛扇，到处作座上客。这种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观察形势的方法，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。”张季鸾英年早逝，又逢抗战中期，其时，大公报的声誉如日中天，张季鸾作为总编辑，受到各界高度赞誉。“三巨头”中，张季鸾算是“骂名”最少，得其所哉的一位。

追求不同，又要合作，因此才有了曹世瑛先生所说的“钩心斗角，相互制约”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他还对众所周知的“三巨头协定”做过一番与众不同的分析：“三年内大家都不得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”，制约了吴急于去政府做官；但“资金由吴先生一人筹措，不向任何方面募款”，又保证了吴的独资经营。胡、张最初只能算是劳方，拿的是劳力股；而胡任经理兼副总编辑，张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，搞的是平分秋色，势均力敌；胡有用人行政之权，张有言论决定之权……如此等等。笔者以为，曹世瑛先生的这个分析，值得大公报研究者关注。在新记大公报23年的历史上，吴鼎昌最早“淡出”。1935年，他出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，依照当初的约定，辞去了大公报社长职务；1937年转任贵州省主席，1948年又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。不过，吴鼎昌做了官，也依然是大公报的大股东，直到1948

年末，才正式公开登报辞去大公报董事一职。1950年，吴鼎昌病逝于香港。

张季鸾是第二个“告别”大公报的。作为总编辑，他一心一意办报，不仅用他的笔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、影响很大的文章，实践了“文人论政”的理想，而且打造了一张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。大公报的迅速成名、崛起，张季鸾功不可没。不过，“三巨头”之间，张季鸾与胡政之潜藏着矛盾。例如，1936年，张提议开设上海版，吴、胡不赞成，张极不满，一度曾准备辞职，直到吴、胡同意了开设沪馆才回心转意；抗战爆发，武汉失守以后，张到重庆，胡去香港，各自分管重庆大公报与香港大公报，直到张去世，两人合作不多。张季鸾1941年病逝，年仅54岁。天若假年，大公报可能又是一种局面。

胡政之与新记大公报几乎同始终，如果加上王记时期，他在大公报服务了27年。较之吴、张，胡不仅能写一手好文章，而且颇谙经营之道。新记开张之初，胡政之已经办有国闻通讯社，新记早期的基于力量就来自国闻社，徐铸成、李子宽、金诚夫等更成为后来大公报的高层。大公报人事问题实行经理负责制，胡作为总经理，知人善任，培养和拔擢了许多人才，为大公报的后续发展储备了力量。新记大公报的最后7年，在吴鼎昌去职，张季鸾病逝的情况下，胡政之总揽大权，大公报能够有四馆并存，发行20万份的局面，胡政之的贡献最大。可以说，没有胡政之，也就没有人们后来称道的大公报。1949年4月，胡政之病逝于上海。有人说，胡政之之死，也是新记大公报之死。其实，胡政之病重之时，天津大公报已经停刊，改组为进步日报。如果他再多活一个月，还会看到上海大公报“新生”。新记大公报走入历史，是一种必然，非胡政之所能左右。
(摘自《闲话大公报》，张刃著)

博
阅

谁啊！别看他是北区稽查处，你在东城演，你家又在西城住，他管不着你。可他要找你麻烦，东城、西城哪儿他都有人哪，人家处长之间怎么都好说话，一个电话不就给你找了麻烦了！”

他这么吓唬你一通，怎么办呢？你要认倒霉呢，你就老老实实去，演完了回来，连车钱都不给。其实这些处长们也给你，哪怕给半价呢！你要不去呢？那就捅娄子了。

我倒了一回霉。那次因为没去唱堂会，得罪了北区稽查处处长。也是该着我倒霉，后来这北区稽查处处长调到西区稽查处当处长了。西区稽查处就在西单白庙胡同。正好西单游艺社开张，请我去演，定的是大年初一开张。春节前几天，快到开演的日子，西区稽查处忽然派人来通知：“侯宝林不能在这儿演出。”游艺社的经理着慌了，赶紧请客。就这样，他们还不放过我。除夕之夜，突然一伙人闯到我家，大吵大闹，要找我算账。当时我正好没在家。同院也有一位说相声的艺人，那天他扮演了一位“好人”角色，出来打圆场，直说：“侯宝林年轻，不懂事，明天早上我带他到处里去

【阅案所得】

爱女去世 让周作人更消沉

周作人于1929年提出“闭门读书论”，实际上是一种逃避。周作人面对历史风雨，无可奈何，身处白色恐怖，又选择“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”，焉能有所作为？周作人只能沉湎于“凡人的悲哀”了。当他从报上读到胡适以犀利的文锋，批判国民党专制，并讨还“人权自由”，而受到当局排挤迫害时，看似心静如水的周作人，不由自主地对“五四”运动的旗手老朋友胡适产生深刻的同情。他写信给胡适说：“‘这个年头儿’还是小心点好，拉伯雷说得对，‘我自己已经够热了，不想再被烤’。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，而且离开上海，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……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，也即是对于国家，对于后世的义务。”

尽管周作人的信中，弥漫出文人的世故之气，但胡适还是十分感动。他回信说，“至于爱说闲话，爱管闲事，你批评得十分对。受病之源在于一个‘热’字”。胡适在信中，还引用了王仲任的名句“心喷涌，笔手扰”来表“最足写此心境”。

胡适在信中，对周作人来信中的一句“交浅言深”，颇“有点感触”。胡适十分动情地说：“生平对君家昆弟，只有最诚意的敬爱，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，此意始终不减分毫，相去虽远，相期至深。此次来书情意殷厚，果符平日的愿望，欢喜之至，至于悲酸。”读此信，相信读者会对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产生敬意：两人既开诚布公彼此人生选择与政治选择上的分歧，或公开论战于报端，或私下通信相劝；同时都遵循伏尔泰的名言“我不同意你说的话，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这些话的权利”，尊重对方的选择和言论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。

寂寥中的周作人，再受致命打击。1929年11月20日，在深秋肃杀的寒风中，他那如花朵般的十五岁女儿若子，不幸突然凋谢。

对于爱女的夭亡，周作人写《若子之死》记之：十六日若子自学校归，晚呕吐腹痛，自知是盲肠，而医生误诊为胃病，次日复诊始认为盲肠炎，十八日送往德国医院割治，已并发腹膜炎，遂以不起。用手术后痛苦少已，而热度不减，十九日午后益觉烦躁，至晚忽啼曰“我要死了”，继以昏吃。注射樟脑油，旋清醒如常，迭呼兄姊弟妹名，悉为招来，唯兄丰一留学东京不得相见，其友人亦有至者，若子一一招呼，唯痛恨医生不置。常以两腕力抱母颈低语曰，“姆妈，我不要死”。然而终于死了。吁！可伤已。

周作人这段文字，不仅写出爱女夭亡经过，特别是若子临终时神志清明，那一切言行，让人历历在目，不堪回首，更是写出作为父亲的周作人肝肠寸断、如触肺伤的刻骨悲痛，令人泫然。

从此，已四十一岁、意识到“人过中年”的周作人心情忧郁，向执教的女子学院告假，“在家，终日怅怅无所之”。为了祭悼爱女，他在八道湾十一号寓所，设祭棚，请来众僧人，置道场，放焰口，诵经文。然后素车旌幡，将若子遗体置西直门外广通寺内，托僧侣诵经。后每逢忌日都诵经悼念，成为惯例。周作人乃受高等教育之人，自称是唯物主义者，他这么做，既是抚慰爱女在天国的灵魂，又是借此抚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灵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表达对一切生命的尊重。

在若子逝世后的十二天，周作人在《世界日报》上连续两天刊登广告，将若子之死归罪于德国医院山本忠孝大夫误诊。这种涉嫌迁怒与报复的心理，有些失态。但误诊乃实情，联系梁启超之死、鲁迅之死，皆是外国医生误诊所致，周作人的做法，似又可谅解。

1930年1月5日，周作人在给胡适的信中说：“去冬十一月次女若子病故，心情恶劣，至今未能安心读书，自思对于死生别无甚迷执，唯子之之情未能忽然。”

3月，周作人在《中年》一文中说，“中年是理智的时代”，应“用经验与理智去观察人情和物理”。但若子之死，他表现得并非“理智”。人啊，有时很难说清。

(摘自《民国清流3：大师们的中兴时代》 汪兆骞著)

【灯下碎语】

手段五花八门 相声界欺负同行

欺侮我们艺人的还有一种是同行。同行中间个别有点名望的人，他惦记着弄外快，起码要钻营喜庆堂会。

靠喜庆堂会发财的人有两种。一种是自己有了班底儿，能唱点儿、弹点儿，反正场上不会空着，包一场堂会有个固定的价钱。叫堂会的本家另要几场名角儿，他就另要钱了，这叫“卖单档”。譬如说本家要一场大鼓，要演员去两次，白天一次，晚上一次，说两段。您是唱大鼓的，您要四十元钱，他和本家说时就加上码了，要六十元，他落二十。到您这头儿呢？他又跟您直说好话：“您知道，我们没底儿。您也知道现在这钱难挣，谁多了谁也不跟您要了。怎么样？我们也不少给您，您给我们提个成吧！提一成，给您三十六元吧！”

另一种就更厉害了。这家办堂会的是官面上的人，他除了要全台堂会外，还要外请几场，譬如说要侯宝林的相声。这些靠经营堂会从中发财的人就对本家说：“好，我一定办。他这价目可大点儿，得六十元来一趟，他有点儿不好请。当然您也不在乎，您办这么大事儿，还在这俩钱儿

吗？不过，话我得跟您说清楚，这事跟我可没关系，我这儿一手托着两家。”

他说这话一方面表白自己没有从中渔利；一方面又让本家对演员先有个坏印象，你要不干，他就好整你。然后他又到你这儿用自己人的口吻对你说：“爷们儿，这回有点儿事得求你。北区稽查处处长家的老太爷(或者太夫人)做寿，你得出一场。这可没有钱。我在这地面上混饭吃，人家管着咱哪！干咱们这一行，惹得起